

模；其四，西汉王朝在修筑长城的同时，一面驻重兵屯戍，一面设郡县在编民塞下充实边防。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从中原地区来到今内蒙古中南部。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区界也因此向北推移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载：“定襄、云中、五原、本戎狄地，颇有赵、齐、卫、楚之徙”，说的就是内地的移民迁徙充实边防。于是内蒙古中南部成了汉、匈、乌桓、鲜卑共同生息繁衍的家园。各民族虽存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但错处杂居、和平共处，不同文化因素互相影响、相互浸润，小聚居、大杂居，农耕、游牧在这里交汇融合，构成了新的地域文化；其五，匈奴单于还曾遣子到汉朝求学，其目的就是学习中原文化。此外，还常常遣子入侍，有的在中原待很长时间，非常熟悉中原的风土人情、风俗习惯。这部分人回匈奴后对中原文化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特别是南匈奴自内附入塞之后，分布在边缘诸郡，屯居北地、朔方、五原、云中，定襄、雁门、代郡（多在今内蒙古境内）等地区，与中原人错居。经过四十年左右，受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匈奴的社会经济、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其中“胜兵”制度的出现，改变了匈奴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结构，使原本生产者与作战人员合二为一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分出功能。所谓“胜兵”，就是脱离生产，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。士兵之外其他人包括老者、体弱、妇孺等人，则专门从事畜牧

业、农业、手工业生产，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实现分离。

第四，匈奴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。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。汉匈战争改变了中原传统的作战方式，骑兵成了作战的主力，而原来只是主战部队的耳目。当然这种变化溯源应来源于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或更早。而作战方式的变化，基础是畜牧业生产内容与畜牧业养殖技术的传入，推动养马业的空前发达。汉文帝实行晁错提出的“马复令”，鼓励老百姓养马，民家养马一匹，可免三人徭役，西汉人养马的数量迅速增加。汉武帝即位时“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”。匈奴人金日磾（日音觅，磾音低）。长于养马，并为汉朝政府养马。“马肥好”，汉武帝为之奇异，擢升他为马监，这是一个匈奴人传授马文化的典型例证。据记载，汉武帝时期河西有牧苑36所，官奴婢3万人，养马30万匹，牛羊无数。元狩二年一战，一次动员塞阅官及私人马匹14万头。元狩四年一战，动员官马十万骑，私马14万匹，可见当时官府和民



胡 笳